

## 依附论与美国外交史研究

〔美〕小佩雷兹(L. A. Perez) 韩晓燕译 何百华校

唐老鸭在拉美无处不在,它说着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并接连不断地在许多报刊的连环画栏中出现。至少在四种不同版本的西班牙语迪斯尼连环漫画书中,是以它为主角的。而且在几千家电影院中和数以万计的电视屏幕上,几十年里迪斯尼那一系列充满生气的电影给连续几代天真无邪的拉美儿童带来了无穷乐趣。

唐老鸭是谁在拉美的化身?是北美。它传播着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它在和子侄辈交谈时谈论政治,在和父辈交谈时谈论经济。它的用意也许不太明显,但它从不掩饰地说:资本主义好,共产主义糟。唐老鸭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

美国外交史学家并没有详细研究唐老鸭。事实上,一些研究美国-拉美关系的北美史学家对“帝国”和“帝国主义”的概念感到不安,这种不安部分地是由于他们不能摆脱华盛顿所宣布的东西来研究美国-拉美关系的目的是和结果。这恰好经常伴随着一些明确的意识形态假说,其中包括这样的信念:美国政策的手段和目的是合适的、正当的,而且不论西半球发生什么情况,那都是美国政府和它的选民之间的事情。

可以肯定,“帝国”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词会周期性地以不规则的间隔进入编史工作的主流。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有些迹象不可否认:肢解墨西哥、袭击波多黎各、侵犯巴拿马、强占维尔京群岛以及数不尽的武装干涉、军事占领和夺取海关等行为都无可争辩地属于帝国主义行径。

然而,大多数研究美国-拉美关系的学者都认为,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不大值得进行分析,也很少有方法论上的益处。有不少人认为,美国的“罪行”大多限于加勒比海地区,结果,美国与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关系和与南美洲的关系常常被区别对待。如果“帝国”这一观点有什么价值的话,那么它只限于加勒比海周围地区。

关于帝国主义理论效用的保留意见不完全是无稽之谈。主要的理论观点长期以来将帝国主义和领土扩张等同起来。与经济和社会相比,这些理论更加强调政治和军事。从那些观点看来,美国帝国主义被理解为一些孤立的“事件”,是好心而做错事的政府的行为,并非美国与拉美关系中固有的性质。帝国主义不是一种惯例,而是一种例外,是华盛顿较为明智的政府所放弃的行为;伍德罗·威尔逊的新外交是西奥多·罗斯福的炮艇外交的消毒剂,睦邻政策纠正了以前几十年的武装干涉,进步联盟结束了过去对拉美独裁统治的支持。

拉美人长期以来也关注着这些问题,在近几十年里,他们创立了依附论来加以表述。依附论的系统阐述在本世纪60年代出现于拉美,那时政治危机、社会混乱和经济不稳定均在不断加深。1959年的古巴革命标志着同美国主宰西半球的霸权势力决裂的重要一步,并向拉美人提供了新的、可供选择的转变战略。同时,当时的发展理论已名誉扫地、得不到赞同。通过实现工业化以取代进口,从而求得国家发展的观念被证明是错误的,它不能满足自主的、平衡的经济增长要求。相反,经济落后的继续存在和依赖性的增加、收入分配的不均,以及许多地区的人们仅能勉强维持生活——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一件事:情况更糟了。此外,错误地构想出来的工业化战略进一步将拉美经济向多国公司开放。过去的工业化主要是由国外资本为其自身利益而进行的,故对外资极为有益。现代化方案和改革计划均遭失败,曾被大事宣扬的进步联盟也默默地自行消亡,无人惋惜。军事政体遍布整个拉美地区,镇压不断加强。

新的问题引起了拉美人的注意。探究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根源显得越来越紧迫,因为革命运动力求对过去和现在的状况作出新的解

释，并为将来改变状况提出新的战略。依附论一开始就在理论上较为关心整个拉美蓬勃发展的革命，它是理解阶级冲突的一种方法，也有助于系统阐述重建拉美社会的战略。在大多数——但不是全部——依附论阐述中，都认为需要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如果可能的话，采取和平方式，但如果必要的话，也可以用武力。

依附论还将帝国主义放在不同的、更加广泛的关系中，即放在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实际中来研究。这些观点是从一系列重要假说中派生出来的，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大体一致，即经济关系是政治、社会和文化形态的主要决定因素。

依附论模式主要表现在对发达和不发达的解释上。不发达被看作是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而不是一切经济制度的发展所必经的自然状态。因此，不发达状况不能只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因为发达和不发达代表了在结构上和组织上相互联系的国际进程的两个方面。西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在1970年曾说过：“我们所说的依附论是指这样一种状况：某些国家的经济是由支配它们的另一种经济的发展和扩张所决定的。”

不是依附论的所有内容都与研究美国-拉美关系的历史学家直接有关或同样有用。然而，关于帝国主义的依附论观点和研讨外国统治的内在功能的那些阐述确实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审视美洲内部关系动态的基本清晰的概念性结构。

依附论以最为适宜的形式将发达和不发达之间的关系视为研究美国和拉美之间关系的背景。美国（中央）靠牺牲拉美（边缘）而繁荣，后者的贫困是前者繁荣的结果。帝国主义既是垄断资本的扩张，当然不容许竞争，并力求建立一些结构以保证拉美的任何发展都依赖美国并补充美国的需要。

拉美的从属地位可能是为了美国利益而起作用的内部结构造成的。帝国主义作为在内部制度化起来的统治而起作用，并造成拉美社会的内在动力。一个国家的内在特性是由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而定的。

文献包括许多对于手段和机制的解释，依附关系最初依靠这些手段和机制得以建立，随后得

以维持下来。依附性渗透到了各级国家机构，并采取了各种各样形式。外贸结构（即历史上的原材料出口和制成品进口）阻碍了经济增长、影响了收入分配、导致了停滞。这些状况长期以来通过外国援助、私人投资、贸易谈判和信贷交易而继续存在，——这些都是旨在维持社会内部力量均势以保护美国利益的美国政策所用的方法。

依附论模式还指依赖性的社会阶层和军事组织而言。拉美上层社会享有特殊地位和政治优势，他们的作用在于保卫美国的利益。共有的意识形态假说和相同的政治目的将美国和拉美的统治阶级联结在一起，在此过程中创建一个遏制革命民族主义势力的共同事业。拉美军官们都以同样方式在美国接受教育，由美国军事人员培训，其军事装备也由美国军火商供应，故他们不会用与他们的恩人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对待现实。

依附关系决定了其他国家组织的作用，特别是各经济机构和社会阶层的作用。依附性还限制了政治变革的选择和变革的手段。起着支持作用的对意识形态的阐述和文化形式为证实依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它们还要求一种能产生价值观的宗教观点以规定并保护统治集团内的各种组织。这样，在这个结构内就可能分离出一些特殊要素，即技术依附、文化依附、资本依附、意识形态依附和工业依附等。总之，依附论直接或间接地提出，阻碍或限制拉美变革和自主发展的各种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都与美国有关。

不是所有赞同依附论的人都同样关心或重视这种理论。依附论研究了拉美社会的内在动力，认为它是由不发达状况所决定的，而这种不发达状况又是由这个地区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造成的。

依附论主要有三种阐述方法。第一种方法或多或少地把内部（国内）和外部（国际）因素作为依附性的根源加以强调，比较强调如外援、外资和贸易关系这些正式的、制度化的关系，其次才是阶级关系和阶级冲突。

第二种方法将依附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的分支领域和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中央和边缘处于相互对抗的关系中，而且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存在于各个方面，无论何时这种影响都是有害的、带剥削性的。这

种方法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结构以及各阶级与经济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第三种方法是前两种方法的综合。这种方法并不仅仅考虑由外部因素造成的不发达。不发达状态对同一依附结构中的各社会阶层的影响甚至更为重要。这种方法承认资本主义，包括外国资本，在发展中能够起到有效的经济作用。

对依附理论的批评在许多方面对依附论学者提出了挑战，这一挑战涉及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依附论学者之间的争论主要是在理论问题上，来源于一种激进观点，对依附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方法论上，大多来源于自由主义传统。

依附论理论家在许多观点上都有分歧。有些人对理论非常不满，另一些人则强烈反对理论的模棱两可性，一些人坚持强调政治决定经济，另一些人则表示反对；一些人强调市场和贸易关系，另一些人则研究生产关系；有些人更加强调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冲突，而不是阶级斗争；有些人更加强调生产而不是分配。这一系列侧重点的不同又带来了其他一系列分歧。有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尚有发展潜力并建议把领导权交给拥有生产手段的民族资产阶级；另一些人则认为唯有选择社会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作用的。有些人认为，把帝国主义强调为依附性的主要根源，就会忽视内部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作为不发达根源的重要性，特别是，某些依附论观点往往不注意文化、种族、性和民族问题，就忽视了依附和不发达问题的非经济方面。

对依附理论的自由主义批评集中于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方法论问题。这并不是说理论问题不重要，相反，从更广的意义上说，理论确实是个重要问题。大多数自由主义批评都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分析，并指责依附论更多地是意识形态的，而不是以实际经验为根据的。他们认为，依附论学者更注重理论而不是数据资料，依附论的阐述没有经受过严格检验。批评家们指出，实际数据的缺乏，加上没有具体的个案研究，进一步表明依附论的主要前提是猜测性的、未经验证的。因此，实际数据的缺乏似乎把依附论模式简化为一种循环论证的辩论：依附性的国家就是那些没有能力独立发展的国家，而它们之所以缺乏这种能力是因为它们的经济结构是依附性的。

不论是来自内部还是来自外部，对依附理论的评论一般都产生了有益的效果。可以肯定，理论争论将长期存在，既有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那就没有理由相信这一争论会很快停止。然而同时，理论阐述的作用带来了一种相当严密的研究方法，并把注意力集中在搜集实际资料上，同时加强个案研究。

例如，对依附性工业化的研究已为证实依附论观点的主要内容提供了经验式的个案研究，学者们详细研究了阿根廷、巴西、智利的依附性工业化和美国渗透之间的联系。多国公司从当地筹集资本，从而把当地的资本家纳入属于支配地位的经济。这样，多国公司用利润、专利权税、特许费、特权费、支付利息、佣金等形式遣返资本。这种资本流出与拉美向国外输出资本的其他形式相结合，加剧了拉美漫长的支付平衡危机，后来只得以外债进行补偿。接受外国贷款更加削减了国家决策的自主权，因为借方允许贷方在其国家政策形成过程中有更大的参与权，以此作为贷款的条件。还必须向贷方说明本国政策，并得到他们的同意，这样本国经济就得向外国资本开放。贷款必须连本带息付还，这就需要取得新贷款来付清老贷款的利息，这进一步助长了经济渗透，扩大了外国政治控制权，加强了从属关系。

革命前的古巴提供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虽然有点夸张，但正由于古巴个案如此突出，它有助于人们认识依附关系的根源和结果以及内部结构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手段。经过20世纪上半叶，美国资本完全侵占了古巴经济，糖、烟草、银行、运输业、采矿业、公用事业、农牧场和商业都接二连三地成为美国所控制。古巴经济受到了美国资本的支配，由美国技术人员和经理们来管理，并按美国的需要加以组织。公众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政府组织、军队力量及公共机关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美国的影响。大量中产阶级都依靠并伴随美国的利益而存在。古巴人被直接融进美国的消费模式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更加熟知并喜爱北美的东西，不仅是消费品，而且是生活标准，这些对古巴中产阶级的公共和私人生活的许多领域都产生了影响。除图名外，几乎在所有方面，古巴变成了美国的一部分。

古巴革命揭示了依附的本质，寻求独立发展激起了美国的愤怒。为了克服依附状况，古巴人发现有必要改革现存的内部结构，即必须控制自然资源、工业资源和技术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必须重新确定古巴与美国的关系。历史上古巴经济与美国体制相结合已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以致古巴内部结构的变革几乎必然导致与实际上由美国控制的国际结构的对抗，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依附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编史工作问题，其中包括“外交史”的持续功效问题。美国-拉美关系研究中一个可供替代的选择模式强调了可供替代的一些方法论的和理论的结构。对美洲内部关系的了解不能从主要在华盛顿根据总统文件和国务院电讯报道而进行的研究中获得。研究范围须扩大到包括利用拉美档案资料和公共记载，如拉美报刊及其他出版的、未出版的资料——这些都是了解拉美内部关系的手段。

与拉美的关系不能归结为对政策或政府间政治关系的研究，也不能由这种研究来代替。美国-拉美关系提出了另一种现实，要求在一种可供选择的概念性结构中分析其联系及联系的结果。依附论模式表达了帝国主义统治内的结构性关系，美洲内部的所有其他关系均能在这些关系中被找到和了解。换句话说，关键在于美洲内部各个层次在各个时期的相互关系是实力与资源完全

不相等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依附论试图把拉美内部的发展问题看作是不平等关系的结果。

问题的焦点转移到了这一不平等关系的背景 and 结果上，特别是美国的统治手段和作用上。当然，这些在拉美不尽相同，即使在一个地方也不是任何时候都一样。帝国主义本身经常需要面对因进行控制而引起的矛盾。帝国主义常在同一时间造成破坏和维持连续性统治的一些条件。这一制度是不完善的，经常失败。但正如依附理论家曾有力地指出的，通过注意美国的实力，帝国主义制度在其多种形式及存在和扩张中，意味着“关系”的重要变化。

依附论为研究美国-拉美关系的史学家们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观点，用这种观点去分析研究美洲内部体制的运行，特别是美国在拉美存在的形式和作用；以及造成经济增长、描述政治选择、形成思想价值、影响文化模式、形成美洲内部关系的行为。它把美国和拉美“关系”的观念扩大到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化和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唐老鸭的存在显得十分突出，因为它起到了一种重要的社会作用——它既是依附关系普遍性的产物，又是这种普遍性的支持者。

（摘自《美国历史杂志》1990年6月号）

（上接第21页）

环境，运用与平日告诫孩子的规则密切相连的纪律手段。因而，在父母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就更能适应学校教育，具有取得优秀学习成绩所需要的基本技巧。在我们的城市和农村调查对象中，独生子女的父母都比有着几个子女的父母的父母的教育程度高。尽管我们在将独生子女与其他儿童进行比较的复归方程式中对照了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这个变项可能并不完全代表促进幼小儿童智力发展的父母行为。

无论是母亲还是教师所作的评价都表明，性格与品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象在西方一样，长春的女孩子都被评价为比男孩子相对地不私自，更和蔼和乐于助人（即更善良），这种差别大概可归因于性别所决定的不同的社会生活实践。

父母的期望和关心儿童的状况是说明中国儿童性格的另一重要因素。那些认为自己的孩子比其他儿童能干的母亲期望她们的子女日后得到更受尊敬的职业。在上小学之前上过托儿所、幼儿园的孩子被教师们评价为比没有上过幼儿学校而由亲属照看长大的儿童能干、品德好。关于父母所作帮助的其余对照因素与孩子的表现只有不很密切的联系。

总的说来，我们的研究表明，关于中国儿童的表现的许多重要的、相互一致的说明与关于美国儿童的同类表现的一些有影响的说明是相同的。尽管中国和美国的政治与文化有着很大差别，中国和美国在校儿童的学习成绩和性格就其型式和表现而言都是相同点多于差别。

（摘自《美国社会学杂志》1990年9月号）